

复数的作者与文体突破

——谈谈作为戏剧家的莫言

□季进

毫无疑问,莫言几十年的文学创作已经成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生动缩影和重要表征,巨大而持续的影响力贯穿于40年的当代文学发展历史。莫言早在80年代即开疆拓土,以“红高粱”系列声名鹊起,形成了他自己的“风云初记”,而后一路势如破竹,佳作迭出,其主导风格在乡野传奇之外,不断地寻求新变和突破。即使在获得诺奖殊荣之后,也从未懈怠。《晚熟的人》所集结的中短篇小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现代感”,契合于当下的时代律动。不仅打破了“诺奖之后,无以继之”的“魔咒”,更令人油然而生“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之慨。这或可谓萨义德所说的“晚期风格”,或可谓“中年变法”。唯有活力充沛,不愿自我重复之人,才有坚强的心志实现“文学变法”。莫言无疑就是这样一位壮心不已、身体力行的大家。

“新领地”与“旧园子”

戏剧创作是莫言文学生涯的起点,也是他念兹在兹、一直未曾放弃的文体。他的早期作品善于调用歌谣、茂腔、话剧等戏剧形式,此前也创作过不少戏剧作品,近年来更是将创作重心从小说转向戏剧。这是他“文学变法”中的新领地,也是旧园子。

莫言为人瞩目的“文学变法”的另一个新领地,也可以说是旧园子,当然是他的戏剧创作。之所以说也是旧园子,是因为戏剧创作不仅是其文学生涯的起点,也是他念兹在兹、一直未曾放弃的文体。早在《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等作品中,莫言就不断调用歌谣、茂腔、话剧等戏剧形式,给小说文本带来奇妙的美学效果。莫言此前已经创作过不少戏剧作品,比如《我们的荆轲》《霸王别姬》《锅炉工的妻子》等。这些年他干脆宣布把创作重心从小说转向戏剧,一定程度上是回归亦是再出发。莫言之所以要在本色当行的小说之外,全情投入戏剧之阵,固然有其个人兴趣的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戏剧与小说两种不同的文体功能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戏剧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有着更为迅疾的传播速度,更加广大的读者观众、更趋先锋的表达能力。它在形象塑造、能量迸发和创新出奇直接性、即时性和参与性等诸多方面,都可补小说叙述之不足。小说是静态的文本,戏剧是动态的实践,无论是行动力和表现力,还是社会影响力与感染力,后者显然都较前者更易收到即时性的反馈,更有利于作者的自我校正,维持更强劲的戏剧续航力。剧本者,一剧之本也。作为小说家出身的剧作者,莫言在人物塑形、情节铺排和场面调度上无疑有更多得天独厚的经验与优势,但是戏剧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比小说更加快捷、直接、光亮,人物开口,价值缠斗,激烈的矛盾冲突往来



眉睫之间。小说可以冷淬收场,戏剧却难以兵不血刃。小说委婉铺叙的草蛇灰线,到了剧本中则必须短兵相接,五步之内,必要见出个分晓来。而且戏剧从作者寥寥独造的“案头本”,到剧组群策群力的“演出本”,其间也得经过诸般变身、协商与斡旋。有些剧作者事必躬亲,坚持原作的权威性,也有些剧作者则对自己的剧本充分放手,享受“演出本”挑战和激荡的快意。莫言显然是不拘一格、从善如流的后者,总是满面微笑地应对建议和改变,乐在其中地参与剧本的搬演。

“古典资源”与“现实经验”

莫言善于从古典资源出发,对“荆轲刺秦”“霸王别姬”等经典历史故事进行重写和新编。此外,他也怀着热辣滚烫的百姓立场,敏锐地处理飞速前进的大时代中闪闪发光的当代题材,书写具有现实关怀的“人民文学”。

在当代小剧场艺术蓬勃兴盛的北京,莫言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得时空人事风气之助,《我们的荆轲》就成为北京人艺榜上有名的保留剧目,“荆轲刺秦”这样的经典新编,是每一位戏剧高手见猎心喜的题材,而今《霸王别姬》,也是类似的从古典资源出发的尝试和重写。

古典资源重写之外,莫言对当代题材的处理更是出手不俗,比如《锅炉工的妻子》就敏锐地捕捉了飞速前进的大时代中被抛落的手艺人,感慨旧时整个行当的式微没落。集中供暖的实行,使得锅炉工们无事可做,面临着下岗失业的困局。无法接受自己空有一身好本事,却要惨遭时代淘汰的锅炉工,发出悲愤愤怒的嚎叫,就像受伤的野兽那般,使出浑身解数来做最后的控诉。这种直抒胸臆的写法令人印象深刻,悼念那些已不可挽留、默默逝去的旧行当,点染出新旧时代交替之际,时代巨变对升斗小民生计所带来的无可避免的影响。莫言的抒写具备一种热辣滚烫的百姓立场,是属性鲜明的“人民文学”,因而分外得到广大观众和读者的喜爱与认同。

至于现实讽喻题材的《鳄鱼》,在人物命名上与莫言小说命名的习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望可知剧本所蕴含的浓厚的寓言意味。《鳄鱼》中每个人物的言行极尽夸张,可静下心来回味,又是日常生活中应有之义。我们仿佛不经意间会在某个街角,迎面撞上与单无悍面貌相似之人,甚至可能认识不只一位牛布。或者这些在阳光下没有影子的、行尸走肉般的游魂人物,有时竟是某些时刻的我们自身。一如《彼得潘》里的老鳄鱼某次意外吞下了钟表,从此以后,时间就在它肚子里嘀嗒作响。虽然每次和铁钩手胡克船长过招,它都占了不少便宜而令船长头疼不已,然而这经由时间带来的无比具象化的“惘惘的威胁”,个中滋味只有鳄鱼自己才知道。我们会有这样的困境吗?还是可以更狡黠、更轻盈地对此避而不谈,索性从自个儿的头上一跃而过呢?莫言并不急于给出答案,而是步步惊心引导我们不得不面对心中的鳄鱼。这是他的高明,也是老辣凌厉之处。

“生面”与“熟面”

莫言绝非舍小说而就戏剧,而

是在其小说的独擅胜场之外,孜孜开拓了戏剧别样的“生面”,又由生面很快转至熟口熟面,融百花而自成一味,以返璞归真的姿态实现了自我与文本的双重突破。

《锦衣》《酒香》二剧,都是莫言“唱”出来的剧作。歌诗合为时而作,一旦抵达了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程度,即可见莫言已经深入戏剧创作的酣畅淋漓之境,达到了我手写我口、我口唱我心的境界。钱锺书曾经讨论过“心手难应”的现象,指出“自心言之,则发乎心者得乎手,出于手者形于物;而自物言之,则手以顺物,心以应手。一艺之成,内与心符,而复外与物契,匠心能运,而复因物得宜。”(《管锥编》)莫言的心、手、口的圆融,正可谓得诸巧心而应之以妍手。在情不自禁的歌咏之中,在酒饮微醺的美好时刻,莫言保留了足够的书写清醒,可见“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之说,诚不我欺。《酒香》一册巧妙从《高粱酒》和《檀香刑》两部剧本中各取一字,戏剧版《高粱酒》(以小说《红高粱家族》为底本)和《檀香刑》的酷炫登场,昭示着剧作家莫言对小说家莫言的“征用”和“改造”,漂亮地完成了跨文体的自我变革、自我更新也是自我互文。转化为戏剧的《高粱酒》和《檀香刑》,比之“基础小说版”更为鲜活生猛,狂言无忌,“悲歌痛饮忘生死,儿女英雄在我乡”(莫言《题《高粱酒》》),端的是一个痛快。莫言的戏剧语言古宜今,嬉笑怒骂俱成文章。他就以这样的语言风格,风风火火带着他的戏剧人物闪亮登场,让小说读者们又获得了迥然不同的深度戏剧体验。

莫言以其一贯的幽默,尝言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两位那边都发过誓,后半生将穷尽一己之力,好好完成从小说家到戏剧家的华丽转型。然而我们不应忘记,这毕竟是小说家言,个中的揶揄意味和修辞策略其实不能轻易弃置。莫言绝非舍小说而就戏剧,而是在其小说的独擅胜场之外,孜孜开拓了戏剧别样的“生面”,又由生面很快转至熟口熟面,成为大家广泛认可的剧作家。诚如我在另一篇文章所说,“剧作家莫言对小说开放性的借鉴,以有限的舞台兼容了小说的开放性。莫言浸染于欧美戏剧与中国戏剧传统,融百花而自成一味,以返璞归真的姿态实现了自我与文本的双重突破,也为当代戏剧创作拓展了未来发展的可能与空间。”与此同时,复数的莫言也在不知不觉于焉生成:小说家莫言、剧作家莫言,甚至科幻作者莫言——君不见《球状闪电》的前瞻和预流可以一直追溯到1985年,一个人就像一支队伍,作为复数作者的莫言正是这句话的真实写照。多重身份的“莫言们”纷至沓来,这不是魔幻,而是无比真实的现实。

多能文事的文体家莫言,有滋有味又不无游戏地不断拓展疆界,施展着他的文学雄心和文体突破。其间,万变不离其宗的则是那颗来自山东高密乡与红高粱同呼吸共命运的淳朴之心。环顾当今文坛,如此丰富复杂、变化多端、词理弘通、文采焕发者,并不多见,对莫言的理解与阐释也就成了“说不尽的哈姆莱特”。如此说来,我们倒不妨借用学者王德威的那句名言:

“千言万语,何若莫言。”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作家印象

他是造过很多新房子的人

贾梦玮印象记

□苏童

贾梦玮的生活与写作,往往都在人们的意料之外。

朋友圈里很少有这样的范例:初中毕业时候与父母赌气,放弃了高中学业,选择去建筑公司谋生,在喧闹嘈杂的建筑工地上,他把自己的生活改造成了另一所学校:多年以后,他考取了丁帆老师的硕士;又多年以后,他成为了丁帆老师的博士;再多年以后,他戴上了南京大学的博士帽。现在想想也神奇,他少年时代的弃学,竟然是一次抛砖引玉的壮举了。

很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忘了为什么事,我去颐和园老房子里的作家协会,路过《钟山》杂志社,看见茶几上堆着杂乱的饭菜,还有好多啤酒瓶子,原来是贾梦玮在宴请宾客,一如那张作为餐桌的茶几,他的待客之道热情、粗犷,随遇而安。那时候他还是个单身青年编辑,常常睡在编辑部的行军床上,做着青年编辑该做的各种事情,生活忙碌而零乱。我从来没有想到,他在这样的生活里为自己规划了一条通衢大道,趁着栖身颐和园2号的机会,他会经常骑车从那青砖门洞里去,在四周的民国公馆区到处转悠,独自瞻仰沿途的每一栋老房子,瞻仰过后是甄别,甄别过后是搜集历史,记录下来——这种写作的发生,属于因地制宜,也属于随遇而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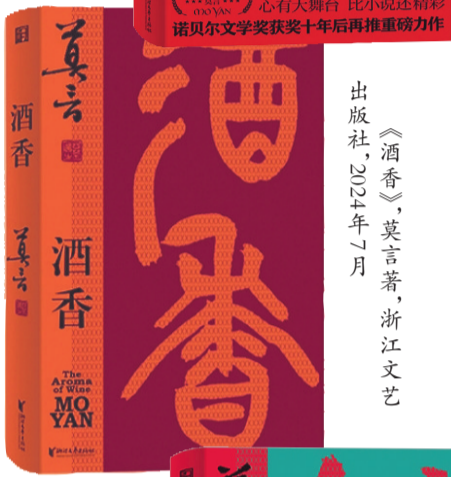
他是造过很多新房子的人,很明显,民国的老房子对于他不仅仅是房子,他对老房子的热情也并非来自对“老”的膜拜,而是对“房子史”的兴趣,准确地讲,“房子与人”——这才是他热衷的写作素材。

《南都》就是贾梦玮当年流连于南京老房子东张西望的收获。张爱玲家的祖宅、姚鼐的钟山书院、鲁迅的江南水师学堂遗址,都留下过贾梦玮的足迹。我至今记得,因为多次考证陈立夫、陈果夫公馆的史料,他后来与陈氏后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陈氏后人每次到南京,必与梦玮一聚。有一次我也有幸幸列其中,与客人推杯换盏之间,依稀感受到历史散发的神秘香气。现在想起来,这香气是被贾梦玮悉心收藏在他的宝库里,适时散发的。

《红颜》当然也是一个令人意外的文本。贾梦玮的长北方向北,情感却常在热带雨林附近徘徊。这本书的书写,他将热情的目光专注于历史中的女性,以及那些女性的深宫生活场域。这是一些特殊的女性,被政治与脂粉的混合物涂抹一身,男性给予他们此生的荣誉,而他们的名字留在历史册页里,是否芬芳美丽,必须等待时间的鼻孔去辨别,宣判者依然是男人。寂寞宫殿必然倒塌,必然消失,他们的身体早已香消玉殒,但贾梦玮在这本书中挽留了他们的音容笑貌。他谈及这本书的写作缘起,自称“无意于做一个女权主义者”,只坚持使用“人”权主义的目光。我喜欢这样的表述,在我看来,“人”权主义的目光,无疑是写作者最宽阔最深邃也最美好的目光了。

难以想象贾梦玮在忙得像陀螺一样的生活里,又结集出版了新作《往日情感》。这是他的热爱,大概也是他选择的责任了。往日情感永远需要书写,为了纪念我们的往日,也为了眺望我们的未来。

(作者系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新作点评

肖克凡中篇小说《父亲和雕像》,《当代》2024年第2期

为那座无言的“工人雕像”发声

□张陵

是在寻找藏在这片地下的宝贝。原来,华北电机厂是在私管的宏大电器厂基础上建起来的,而宏达的老板章守才则是李玉福的岳父。当年,章守才确实得见过几件值钱的古董,在公私合营期间转手给了古董商,还留下了字据,并没有埋在地下。这笔钱留给了女儿过日子,李玉福认为这是一个道德上的过失,主动放弃了当劳模的资格。多年以后,他决定弥补当年的过失,用这笔钱支持挖掘伽马射线探测仪的工程。知情人得到资料,告知仪器没有埋在地下,而是保存在工业遗产博物馆里。工厂遗址上那一尊未完成的汉白玉工人雕像,李玉福决定资助艺术家,把雕像创作完成。

光看故事情节确实有些非逻辑、有些跳

跃,内在关系却很真实。首先,工厂是破产了,但工人的心却是完整的、相通的。李玉福生重病,在东莞给人打工的厂长打电话要李玉福动用伽马刀先进治疗技术,口气很硬,又恢复了厂长的权威。党委书记去新加坡投靠儿子之前专门上医院看望,第一句话就是“没让你当上劳模,不恨我吧”,分明是做思想工作的口吻。两个领导之间关系并不融洽,但都关心着只会闷头干活的“骆驼李”。而李玉福想到的是,别让当年的那台仪器影响工友们的今天的生活。实际上,仪器之事与他无关,他只是心里老惦记着工厂工人。这种人际关系表明,工人们之间那根看不见的情感纽带一直就很牢固,人散魂不散。

而且,在工人们的心灵深处,还是有一种

挥之不去的压抑感。他们服从了命运的安排,开始重新择业。“80后”李秀柱干广告,田铭进了物业公司,杜玉雯干上了媒婆,就算住进被称为“城市幸福生活名片”的小区,他们内心还积蓄着郁闷,难免通过一些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杜玉雯突然变得爱说话了,还很恋旧,只要吃按老婆生前“手抄本”家庭菜谱做的饭。得知草坪下面埋有放射性仪器时,老工人刘振岭反应很激动,甚至有点无理取闹,差点没把李秀柱扣住不放,看上去是在维权,其实更像压抑心情的曲折释放,或是在表达一种忧患意识。

第三,他们到底是厚道的人、有信仰的人。李玉福一直认定岳父留下古董不够正当,成了多年心理症结,一定要把这笔钱拿出来回

报社会,才算治好自己心病。这背后有着传统价值观、道德观和财富观依托,有工人阶级的时代信仰支撑,思想脉络相当清晰。在当代社会,他们可能处于弱势,但初心不改、信仰不变,与流行的世俗理念不同,本身也产生了思想的力量和精神的力量。

故事中真正荒诞的,可能是一些社会现状。小说描写社会无端刮起“探宝热”,做“发财梦”。那两个文物基金会的人完全是受利益驱动,一门心思想在草坪下找到宝贝,还试图诱骗李玉福的那笔良心钱,由此折射出当代资本影响下的社会价值取向、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小说描写得云淡风轻,却也透着深刻的批判意识。

读《父亲和雕像》自然而然会联想到,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制造业大国,正在向世界制造业强国迈进。如果比较着读,还会往下想,中国工业发展艰难曲折的奋斗之路,离不开工人阶级的付出、牺牲与贡献。就像小说中那座未完成的工人雕像,它从历史过来,从小于碰上了晚年的电焊工李玉福。雕像虽不会发声,却分明在说,我永远都在。

(作者系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辑)

工厂、工人是作家肖克凡心中永恒的情、永远的痛,也是他不断书写的动力。在中篇小说《父亲和雕像》中,情更浓、痛更切。工厂没有了,变成了私营的高价房地产项目。许多工人和后代都住在这个楼盘里,每天脚踩着老工厂的这片土地。这个巨大的落差,构成故事的现实背景,似乎在给历史的、时代的神经传递着隐隐的痛感,也给这个平实的故事添了几分悲情。

故事主线的推进过程乍看有点荒诞,得肺病住院的老电焊工李玉福听说要安排伽马刀手术,立刻想起了往事。当年,属国营大型企业的华北电机厂承担了援助巴基斯坦的政治任务,要求发电机组保证质量,不能出错。技术要求李玉福主导电焊,连续干了两天两夜,经伽马射线探测仪反复检测,全部合格。后来仪器失踪,李玉福认定有人把它埋到了工厂地下,也就是现在高价楼盘那片绿地里,一定要儿子李秀柱想办法挖出来,以免射线伤人。“工厂的孙子”李秀柱在小区转了几天,终于暴露了意图,引发了居民的恐慌。

还有其他人也在惦记着这台仪器。两个自称文物基金会人员,看似在帮李玉福,其实